

汪纪明 著

文学与政治之间：

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

Wenxue Yu Zhengzhi Zhijian

Wenxue Shetuan Shiye Zhong De
Zuolian Jiqi Chengyuan



汪纪明 著

文学与政治之间：

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

Wenxue Yu Zhengzhi Zhijian

Wenxue Shetuan Shiyeye Zhong De
Zuolien Jiqi Chengyu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汪纪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61-0732-4

I. ①文… II. ①汪… III. 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942 号

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 汪纪明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1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左联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社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加之不少左联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掌起宣传、文化部门的权力，因而在文革前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左联一直得到高调肯定。十年浩劫之后，关于左联的研究一度冷清，近年有所回升，并且日趋学术化。

汪纪明同志最初提出以“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曾担心不容易做出新意。但纪明同志提交的论文让我颇有意外之感，也赢得了答辩委员会的好评。在过去以革命为主线的文学史叙述中，政治意味浓厚，而左联的文学属性则有所忽略。纪明同志抓住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运用历史还原法，细致辨析文学史叙述中的左联与史实上的左联之差别，呈现出历史现场的左联，也还原出关于左联的历史叙述的建构过程。通过翔实的考察，使得左联成立大会与组织机构这些过去似乎已经明了的情形，变得更加清晰起来。这些固然都有学术价值，但在我看来，更具学术生长空间的是后两章。通过杜衡与蒋光慈这两个作家的典型分析，努力寻找左联组织与成员之间多层次的关联，由此揭示出左联作为文学社团的基本属性与内部的分歧矛盾，呈现出左联成员构成的复杂性与选择的多样性，还原出

一个多因子、多侧面的左联形象，有助于改变关于左联单一面孔的历史叙述。左联虽然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但毕竟有别于政党，政治性与人情味交织在一起，左联的文艺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形势与文学发展的需求。这样的考察，不仅对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左联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如何认识和处理社团与个人、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当下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不无启迪。

纪明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我们有过较多的交流。她的长处是严谨扎实、思辨绵密，这一点在论文中有所体现。如今她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作为指导教师自然是高兴的。关于左联与左翼文学及期；目关的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生态，值得探索的问题还有不少，希望纪明同志进一步拓展空间，推出新的成果。

秦 弓

2012 年 3 月 29 日于北京远郊

目 录

导论 文学史:行走于历史与文学之间	(1)
第一章 左联的身份:从“定性”到“定位”	(31)
第一节 文学史书写中的“左联十年”	(32)
一 “左联十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确立	(33)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种文学史书写方式	(37)
三 “划时代”的左联	(42)
第二节 文学史中的左联定位	(45)
一 从“组织”到“流派”	(46)
二 《左联回忆录》中的左联	(52)
三 左联纪念活动与左联的身份	(62)
第三节 作为文学社团的左联	(69)
一 从“属性”到“身份”	(69)
二 文学史中的“左联五烈士”群像	(74)
三 “流派”、“社团”和“组织”	(84)

第二章 社团视野中的左联	(93)
第一节 左联成立大会	(93)
一 左联成立的文化背景	(93)
二 左联成立大会人数考	(99)
三 左联成立的动因	(106)
第二节 左联组织结构考(上)	(113)
一 文化支部与左联	(113)
二 左联的“组织法”	(120)
三 左联党团	(126)
第三节 左联组织结构考(下)	(132)
一 执委会与常委会	(132)
二 行政书记、秘书处及其他	(138)
三 左联成立大会决议	(143)
附录:出席左联成立大会人员小考	(148)
 第三章 同“左翼”渐行渐远:以杜衡为中心	(161)
第一节 对左联的“失望”:杜衡与左联	(161)
一 出席左联成立大会:并不突兀的决定	(162)
二 “左翼作家”的形成	(168)
三 与左联批评家的分歧初现	(173)
第二节 对“干涉主义”的反拨:对政治的警惕	(178)
一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	(178)
二 介入论战之前的杜衡	(184)
三 杜衡回忆中的“第三种人”论战	(190)
第三节 “第三种人”与左联的对立之塑造	(195)
一 “机关刊”之辩	(195)

二	左联内部的论争	(199)
三	对“关门主义”的反思	(206)
四	《新垒》:对“文艺自由”论争的别样描述	(210)
小结		(217)
第四章	政治身份与左联:以蒋光慈为中心	(219)
第一节	在革命与文学之间	(219)
一	从革命圣地归来	(220)
二	介入文学社团	(225)
第二节	从太阳社到左联	(232)
一	春野支部与太阳社	(233)
二	《丽莎的哀怨》	(238)
三	“脱党”与“开除”	(242)
附录:	加入左联之后蒋光慈的著述及出版情况	(250)
结语		(253)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69)

导 论

文学史:行走于历史与文学之间

当代文学诸学科中,“文学史”无疑是成熟最早的一门学科。如果将古典学术传统中的“文章流别”,以及古人之于“诗”、“文”、“词”、“曲”等的历史演变的观察、叙述、研究视作“文学史”的研究的话,其学术史的脉络则可推至两千数百年之时。即便从林传甲、黄人《中国文学史》的问世算起,国人对“中国文学史”的系统研究也已有百余年。在“元叙述”、“元理论”兴起的当代学术语境中,“文学史”本身也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文学史学”乃至“文学史学史”、“文学史研究史”之类的著作已经开始大量出现,追问和确立“文学史”自身的叙述方式及其合法性已然成为当代文学界的重要议题之一。经过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讨论,虽然在“现代文学”的学科命名、文学史分期乃至现代文学的开端、对象等一系列问题上,学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分歧,但文学史,特别是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要走出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以“政治话语”为基础的话语形态,则已是基本共识。然而,告别“政治史”的“文学史”又当如何,甚至这种告别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这些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限于专业、学力,在本节中,将以现

代文学史为主要讨论对象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追问和思考。在进入议题之前,简单勾勒一下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史”之形成的历史轨迹似颇有必要。

一 “学科”何谓:一个讨论前提的廓清

就“名”而言,汉语中“学科”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唐代即有人尝试将《孟子》立为“学科”:^①“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①换言之,至迟在中古文献中,“学科”即已有“学之分科”的含义了。明代董其昌撰《学科考略》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叙历代立学之制,兼叙孔庙封赠配享之始,而贡举之志兼及焉”,即书中所考者当为中国历代国家办学和科举制度。就“实”而论,“学”之“分科”也不始于近代,中国古代的“六艺”,古希腊教育中的“七艺”等,都是“学科”的早期形态。然而,当我们在“学科”的意义上言说“现代文学史”,并尝试为现代文学史确立属于其自身的学科属性时,一个首先需要追问的问题应当是“学科”究竟是什么。

“学科”的形成,源自于人对知识的“分类”自无疑问,由此,谁、出于怎样的目的、根据怎样的标准进行的分类,就成为追问“学科”时必须予以考察的议题了。中国学术分科思想的追溯、讨论及其同西方“分科”思想之间的差异,自然都当予以重视^②,但窃以为,在思想史研究深入的同时,不应当回避一个更为简单,也更为基本的前提:“学科”作为一个词的含义。

①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2。

②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对中国学术分科历史讨论颇为详尽,可参考。但遗憾的是,作者在“七科”之学中似乎唯独遗漏了对“文学”学科的讨论。

《汉语大词典》中“学科”共有四项释义：

1. 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学业科目。2. 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经济学等。3. 学校教学的科目。如语文、数学、地理、生物等。4. 军事训练或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的科目（区别于“术科”）。

在“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学科”的判断中，义项1、4当然地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学问的门类”和“学校教学的科目”这样的两种含义却依然在这一判断中并悖杂呈。表面来看，二者的区分是显然的。作为“学问的门类”的现代文学史“学科”意味着“现代文学史”是由学术界根据研究对象等因素确立的一门有着属于自身的学科特质的“学问”；而作为“学校教学科目”的现代文学史，则意味着它是由教育机构根据教学需要规划出的一门存在于大学课程系统之中的“课程”。二者分属于学术和教育两个不同的领域，其“划分”的主体和标准都各有不同。然而问题在于，“学问”和“课程”，“学术界”和“教育界”，甚至于“学科标准”和“教育目的”，这些构成二者区分的因素之间却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和逻辑联系，“现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性的“学问的门类”的“学科”，在相当程度上乃是由它作为大学教学的“科目”抑或“课程”所促成的，甚至于“现代文学学科本来就是由大学中文系的教学需求所催生的”^①。而这又恰恰意味着两种释义表面上似乎一目了然的区分变得复杂

^① 温儒敏：《“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了起来。

更为复杂的是,在具体的语用环境中,“学科”的含义更发生了基于其语义的衍生和发展,在不同的“学科系统”中,“现代文学史”的名称及其在系统中的位置均有不同。1990年,贾植芳先生在为《中国现代文学词典》所撰写的《序》中谈道:“不知从何时起,‘新文学’这个概念渐渐地为人弃置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文学’……这样,就使我们这门学科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形与体的自相矛盾之中。”^①而1980年代掀起的围绕“重写文学史”而展开的讨论中,则又出现了一个“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在学界,围绕着这几个概念曾有过颇为激烈的讨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同“新文学(史)”、“二十世纪文学(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迄今仍无“定论”。

同学界在学科的命名、界定的多元取向相比,国家教育和科研的规划、管理部门则需要一个更为稳定的学科、专业系统。1980年代中国正式确立“学位制度”之后,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办公室颁布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国现代文学”名列“文学”学科门类下“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第二位,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实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通知》,并对《草案》进行修订,在新的《目录》中“中国现代学”更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目录·说明》指出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内,“专业目录共有专业620

①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种，专业范围大体相当于二级学科”^①。1997年，进一步调整了二级学科（专业）的范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的地位得到了延续。^②这样，在大学博士、硕士的招生目录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同“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并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下，由高校自行设置的一个“学科方向”。《目录》是中国高等教育硕士、博士招生、学位授予、规划、统计以及高校学科点、学位点申报、评比乃至课程设计等的指导性文件。在某种意义上，进入这一《目录》并获得较高层级，乃是一门学科在高校、科研机构拥有专门性的“学科点”和研究梯队建设的合法性基础。

同《目录》并行，且影响较大的“学科系统”还有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11月1日批准，1993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以下简称《标准》，标准号GB/T13745—92）。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当代文学史）”（而不是“现代文学”）是同“文学理论”、“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各体文学”等并列隶属于“文学”这一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两者相比，《标准》主要“适用于国家宏观管理和科技统计”，而《目录》似更侧重“专业”的划分，加之颁布较早，其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院系、专业建制的现实性影响要直接和深刻得多，以此为中介，《目录》同样极大地影响到了当代中国诸学科的基本格局。

行文至此，可以对本书中使用的“学科”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廓清。首先，在学术领域中“学科”意味着一个有着专门性的研究对象和学理逻辑的“学问”类型，

①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0年。

②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

也即《标准》所谓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其次,在高等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学科”意味着一门有着专门性的教学内容的“课程”。最后,在教育、学术管理的制度中,“学科”则意味着有着较为稳定的“专业队伍”和“专业领域”的“专业”。就逻辑而言,“知识体系”无疑是“课程”和“专业”的基础,它是“课程”的“教学内容”,也是“专业”得以划分的基本学理依据。然而,历史地来看,三者之间却构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关联,“课程”的设置,不仅构成了“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专业的确立、发展的现实性因素,同时,“课程”还是“知识体系”的传承以及“专业”人才队伍培养的必由之路,而“专业”的确立之于“知识体系”自身发展则又提供着制度性的保障和推动,同时也对“课程”的设置提出了制度性的要求。但“课程”、“专业”、“知识体系”并不直接地构成对等关系。首先,“知识体系”构成“课程”的内容,但并不意味着“知识”乃至“知识体系”必然和必须通过“课程”予以传承,更不必然地成为制度内的“专业”。其次,由于教育活动本身的规律和要求,“课程”的设置必然地包含着超出“专业”和“知识”之外的内容,譬如一些技能性、实践性课程显然难于归入“专业”和“知识体系”意义上的“学科”范畴。

在厘析了“学科”诸义项所指之间的相互关联之后,我们尝试以“现代文学”学科为对象,去具体描述其知识系统之形成、学科建制同学术向度之间的相互关联,由此去追问在“历史”和“文学”之间,“现代文学史”的学科走向。

二 现代文学学科之形成轨迹

在相当的意义上,“现代文学”学科的“知识”是同“现代文学”共同产生的。就在现代文学自身形成的过程之中,知识

界对作家的传记性关注、研究，对文学作品的评论，现代文学社团对于自身文学观念的阐释即已同步展开，而所有这一切恰恰也直接构成了“现代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过程。甚至于就在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同时，它就已经开始在一种（或者说多种）“文学史”视野中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对此，陈平原先生曾精辟地指出：

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化人从一开始便有明确的“文学史”意识……比起此前中国历史上众多诗文革新运动，五四一代更喜欢在“文学史”框架中讨论问题。不管是“破旧”还是“立新”，讲“进化”还是主“演变”，其工作动力及理论预设，均来自“文学史”的想象。构建一种文学发展模式，在重写文学史的同时，树立自家旗帜；而革命一旦成功，又迅速将自家旗帜写进新的文学史……仅仅十几年时间，五四新文化人已经完成了“盖棺论定”——包括运动的历史定位以及著作的经典化过程。^①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历史角度寻求“诗文革新”的合法性基础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态，而以“复古”名义行“革新”之实的“诗文运动”也屡见于文学史中。然而“五四新文化人”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在“文学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中去寻求和确立“新文学”的价值。进言之，五四新文化人不仅是“新文学”（现代文学）的主体，同时也是“新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的主体。由此，一个问题开始浮现，究

^①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第70、71页。

竟是什么使得“五四”一代有了这种对于“传统”的超越的可能和诉求。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自然需要从“五四一代”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境遇、文化心理、学术语境等多方面进行追问和讨论。不过,窃以为,在此过程中,现代大学教育系统中,“文学史”学科的崛起,乃至其于时代知识体系乃至思想维度的塑造,却是一个颇值关注但却往往为人忽略的视角。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学史’的神话,正是从世纪初期‘文学史’被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门课程而开始的,或者说,‘文学史’的权威正是通过并且依靠现代大学教育体制而形成的”^①。而“五四一代”所以能迅速完成其对自身在“文学史”的脉络之中的定位,与此当有莫大的关联。

在历史学特别是教育史的视野中,由戊戌变法催生的晚清“壬寅”、“癸卯”两部学制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重视,作为其重要组成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1904年)之于近代大学分科乃至课程设置的影响也颇为学界所重。就文学学科而言,当代文学诸基础学科几乎都可从这一《章程》中的课程设置中寻找得到相应的源头。以文学史而言,《章程》中文科大学各外国文学门(相当于外国文学系)均设置相应的“文学史”,唯中国文学门无“中国文学史”,而代以“历代文章流别”。在《章程》制定者——处于彼时的“统治核心”处的中国知识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对传统文化最为熟悉和认同的知识者)看来,“中国礼教政俗,与各国不能尽同,现在学堂讲求实用,一切科学取资于各国者居多。然亦有中国向有之学,为各国所无,应加习者;有各国所重,而与中国不宜,应暂

^① 贺桂梅:《“现代文学”的确立与50—60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教育学报》2005年第3期,第83页。

从缺者”^①。以“中国向有之学”“历代文章流别”取代“取资于各国”的“文学史”也就顺理成章。但《章程》同时指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②。换言之，虽则《章程》并未直接出现“中国文学史”的提法，然而，它却在“文章流别”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之间架构起了一个直接的学术谱系关联。

不过，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迟至1910年始得开办^③。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2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命令“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理监督事由严复暂行管理”^④。5月，改称“北京大学校”。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次年公布大学规程，对大学课程进行了重新的规划，“中国文学史”取代“历代文章流别”成为“大学文科”文学门下国文学类第5门“科目”。仅就制度规程看，从1904年《奏定大学堂》颁布，到“中国文学史”“名正言顺”地成为大学“本科”必修课程，中间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⑤不过，在此期间，“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型构，不仅已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且收获颇丰。1910年前刊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至少已有如下数部：笹川种郎的《历朝文学史》（1903年印刷，原著作于

① 《奏定学务纲要》（1904年1月13日），《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页。

② 《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56页。

③ “京师分科大学……规模初具……现在中外各科教员均已到堂，应行升学各生，业经详加考验，分别录取。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行开学礼。”《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④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⑤ 限于文献，京师大学堂第一届“分科大学”的课程、授课情况尚不详，而历被视作“第一部国人自撰文学史”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实为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中国文学”课程的讲义，则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课程的开设究竟始于何时，似仍有考证必要。